

作为未来的过去

董成龙

阿伦特与马克思更重要的内在关联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年仅 25 岁就完成了名文《论犹太人问题》,除非所有人都解放,否则犹太人无法解放;《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是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述,这不是一部历史学作品,所以重要的不是她有关欧洲犹太人受难史的描述,而在于对艾希曼审判的反思,比艾希曼审判更重要的是艾希曼事件。

心灵拥有自我栖息之地，
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
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弥尔顿，《失乐园》

古今之变

2008 年，电影《朗读者》上映。女主角不自觉地成为纳粹的帮凶，战后遭受审判。她邀请一个男孩为她朗读——这

意味着她可能不识字，是文盲。在古典时代，朗读和讲演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备技艺；而在现代，却成了文盲的标识。女主角作为朗读的对象，标志着她可能是个智识平庸的人，她所犯下的罪恶是平庸之恶。朗读者与平庸之恶的勾连，是逆转古代朗读与高贵公民的关联。由此，这部电影成了五年后《阿伦特》的序曲，也是理解后者的秘钥。

阿伦特（Hannah Arendt）

是一位女性犹太政治哲人——标签化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阿伦特多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她通古今之变，阐明古今“劳动”（labor）之变，直指“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变迁，成一家之言。阿伦特早年追随雅思贝尔斯研究奥古斯丁，完成博士论文（爱）；1920 年代末开始研究现代犹太史（灾难）（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第 154 页）。1963 年，美籍犹太人阿

伦特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接近一个甲子之后，该书全译本在汉语简体世界问世（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本书繁体中文版已经出版，译作《平凡的邪恶》，玉山社，2013 年）。

阿伦特在《全能主义的起源》中捎带脚地提到了古今智术师的差别，古代智术师追求一时的论辩胜利，而

现代智术师则追求永恒的胜利。智术师是伪装的先知，现代智术师的极端体现是全能主义领袖，它是武装的伪先知，凭借强大宣传（笔杆子）与政法机关（枪杆子）实现全能统治。全能主义（日译“全体主義”）以力为理（**Might is right**），枪杆子自动涵盖笔杆子，以武力废弃言辞，又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政体

（下转 14 版）➡

➡（上接 12 版）

场的关系,这条主线一定要改好。”袁恩桢说,他之前写过文章主张政府和市场“双强模式”——强市场、强政府,“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在微观领域,市场经济要强,在宏观领域,政府必须强,这是解决市场经济过程当中效益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谈起专业问题的袁恩桢似乎换了一个人,严肃而坚决。说到今天做经济研究,他认为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中青年学者来讲,他们中的很多人西方经济理论学得多,所以容易偏向西方经济学领域,比如对我提出的‘双强模式’,很多年轻人不赞同,对国有经济的指导建议,他们也不太同意,甚至有些人提出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竞争性的产业领域,我是对此极力反对的。”

近年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派在学界受到热议,袁恩桢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三大构成:一,要引进市场经济理论,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市场经济。二是继承,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公有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基础。第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要创新发展。创新是在引进、继承的基础上,离开前面两条,创新就做不下去。在三大架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袁恩

桢勾勒的正是他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来自“田野”的思考

提起恩师袁恩桢,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一代学者是实践与理论融合的一代,他们通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实践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发展相融合,又大胆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客观理论,然后再进行融合、创新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一代代做融合的学者,就没有我们在这批中青年学者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毕竟,注重各种理论相互借鉴,注重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这就是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动力。袁老师这一代经济学家显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经验。”

这番话正是袁恩桢研究工作的缩影。经过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个阶段,袁恩桢感到他的思考方式越来越偏向经济理论跟实际的结合。“从实践中提炼理论,这条思路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现在走的这条路前无古人,是伟大的探索,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模式是从来没有过的,把它讲清楚、做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再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个新的关系,我尽管把它概括为‘双强模式’,但这个模式到底如何,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袁恩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治学成果大部分都来自他的“田野”经验。他说经济理论有个特点——随机性,所以从书本到书本肯定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理论被否定,要推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研究产生。他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世纪 80 年初深圳、珠海特区刚刚成立,上海市经济学会组织了 10 人团队去考察,进入得早,考察得也比较深。那趟回来,考察团此前抱有的疑问,比如开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放的难度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在调研中得到了答案,形成了多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投给《人民日报》,也成为《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一份详尽考察报告。

1986 年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题,又组织了 10 个人到浙江温州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当时袁恩桢许多发表的文章都是以此为内核。私有经济,在当时是社会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袁恩桢一行人刚到温州的时候,正是温州模式遭到有关方面重重责难之际,却也为调查组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温州方面第一次看到这个规模的调查组,还是来自上海理论界的,对我们非常欢迎,把所有资料都提供了出来,毫无保留,我们调查了

一个月,形成一本专著《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这是关于研究温州经济发展最早的一本专著。”在这本著作里,袁恩桢等经济学者基本肯定了温州经济发展模式,认为这是贫困农村致富的一条捷径。“改革开放后,独立思考的空间大了,仍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到处走,到处看,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边许多学者都热衷实地调查,今天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很多是从当年的调查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袁恩桢说,尽管当时条件有限,但是他每年都要走出办公室,有目的、有课题地做一些调研。近的,考察过上海当地企业,远的到过西南、中南、西北等地。1987 年在广西百色的所见所闻更是让他清楚了一个现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那些风景秀丽的山区仍极其贫困,有些还有刀耕火种的痕迹。“从带有原始社会痕迹的生产力,到计划、半计划的生产再到最现代的生产,中国都有。如果开个关于生产力历史的博物馆,中国最有条件。”虽是句玩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那趟考察后,袁恩桢提出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化的理论,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各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应有发展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非主流,受到不少质疑,但袁恩桢还是坚持自己的理论:“我坚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也相信理论与实践打磨出来的东

西不会出错。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从理论与实际出发给出建议,而不是迎合一些风向。”

袁恩桢非常重视把“田野”里收获的这些理论变为决策建议,把所思所想交给社会,为发展所用。他始终觉得研究不只是学术圈里的事,研究工作还是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经济理论,它的实用性很强,所以要更好地去表达,让所有人看得懂。”浸淫经济理论研究多年,与那么多专业名词打交道,袁恩桢很担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人可能看不懂,因此他写文章,追求的是深入浅出,让社会上各层面的人都能读得进去,对于这一点,他一直坚守原则:“写文章是一定要给人家看的,看不懂,写来的意义何在?要进得去,出得来,这是我一直提倡的。”

末了,记者请袁恩桢对多年治学成果做番评价,老人家难得一笑:“不可能完全满意,但应该讲我是尽我的力了。我一直讲,社会给我的比我所付出的更多,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满足。”

更正

2017 年 3 月 17 日本刊第 284 期,9 版《音容从此隔秋风》一文提要误与 10 版《什么是理想的新经学》一文提要重复。特此更正。